

他分卷的内容缺乏专业知识，完全没有资格妄加评论。不过，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总编委曾经多次召集我们，讨论有关丛书编纂的种种共同问题，我目睹了主编其他分卷的各位学者的认真工作。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就个人的理解而言，我还是认为：我们的工作的本质，是对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广泛的批评性总结活动的一种自觉参与。

要做总结，首先当然是要清理基本的事实。因此所有分卷的主要目标都可以说是“描写”。不仅在第一、第二两编中，以一级学科总论和本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之分论的形式，来描写该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而且特意编纂了第三编“重大争论”、第四编“教育与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与刊物、中外学术交流和丛书出版”，以及大事年表。希望依靠这样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一幅比较完整的学科发展的总貌，给有心检索的朋友提供较为方便的工具。当然，是否完备是不敢轻易担保的，也许还有挂一漏万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担保的：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历史怀有充分的敬意，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和记录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要因为我们主观的立场而过多地影响到对事实的描写，至少不要因此而遗漏了重大的事件。20世纪的实际生活复杂多变，而且人们的档案意识也不是一贯很强的，因此我们梳理事实的工作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工作也可以有学术积累的重要意义。

任何“总结”，都是批评性的活动。我这里说的“总结”，自然不同于某些行政首长一锤定音的报告，绝对不是独断的排他的东西，而是编撰者眼里的历史，因此就包含了选择、解释和评判。这些主观性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是否正确或正确的程度如何，并不以我们自称“总结”就有了保证。就以哲学卷的编纂而言，虽然本卷的内容是知识性的，但是哲学本身的特征却是即知识而超知识的。因此，更公允的说法应该是，当我们描写20世纪哲学及其各二级学科（且不说这种分类是否合理，我们只以它是当前学院建制的事实而言）的演变过程的时候，自然以编者所理解的哲学为前提。我不必讳言自己的哲学立场和观点。我以为20世纪中国承接19世纪末的大趋势，发生了重要的哲学革命：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经受了现代洗礼，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有广泛的传播，这两大传统经过中国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使得20世纪中国哲学呈现出与古代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它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以哲学革命的方式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文化动力；又与其他因素一起，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之所以是“中国的”，而不同于那个“单一的现代性”。

毋庸讳言，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另一些说法：鄙薄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成绩，好象一谈中国哲学就是传统的儒释道；中国本来没有“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大成问题；更甚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哲学史”大多是“汉话胡说”，

而翻译西方著作不过是“教洋人说中文”，如此等等。其实，这些何尝不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种“批评性的总结”？但是偏向否定性的。不过要化力气否定，则正说明它之无法绕过。所以也尽可在众多方式的“总结”中聊备一说。现在我们编的《哲学卷》，其内容只限于20世纪，但正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家应对现代社会的巨变、翻译西方著述、建设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等过程中，中国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牟宗三、冯契等）创造了堪称现代中国哲学的种种系统。我们一边说学无新旧、学无东西，一边也得承认一代有一代之学。尽翻前代旧案，是一种学问的进路，承继前辈的问题而继续推进，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关键是在其进路上是否真正有所创新。所以，尽管我们在参与《哲学卷》的编纂过程中时感惶恐，因为要在那么短的篇幅中讨论许多复杂的问题，其困难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我们的哲学修养还没有高到可以使我们能绝对避免错误，更何况还有许多外在的限制。另外，多人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是不错，一不小心火候有大小，烧了夹生饭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们求真的心是真诚的，而且我们只是将自己的工作看做是向当代哲学界的讨论会提供一份自己不成熟的报告。有一位哲学家曾预言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状况：对以往哲学进行深入的总结，这种总结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中国哲学有望融入统一的世界哲学。预言常是期望。通过研究和批评20世纪中国人在哲学领域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来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使我想起宋人欧阳修的一句诗：“早起前山路正长”。这可以表示我现在的心境。

政治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世纪期盼

□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授 王邦佐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

终于如愿出版了，这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也是当今政治学者历史责任的体现。

当人类社会建立公共权力时，人类就开始了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在其享有盛誉的《政治学》一书中写道：“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这些文字已经过去了2300多年，但它至今仍旧给人以深深的启迪。政治学产生于社会生活的深层需要，它必然关注现实生活，并为现实生活不断提供政治智慧和决策参考。在编撰本书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百年内时代之变迁，政权之交替，生态环境之变化，日新月异，变幻无穷，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五花八门，极其复杂，但我们同时也领悟到，作为经世致用之说，中国近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



“至善”却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一条主线，那就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怀。无论是学科构建，还是研究志向，都可以看作是围绕这条主线在展开。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的成长肩负着现代化这个特殊历史使命。引导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政治学 100 年来的世纪期盼。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学在本土文化氛围中，开始学习、引进西方近代政治概念和学科架构。那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学与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etc 中国近代重大社会事件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学研究，其主题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状态。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等各种理念和政治设计，一概无能为力，都没有也不可能引领中国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

辛亥革命前后，欧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体系和观念被系统地、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和借鉴了英美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提出了民权主义、五权宪法等思想，构成其政治设计的理论依据。这位革命先行者希望借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将中国传统的君主政治改造成成为民主政治。然而，由于其学说的先天局限性，也没有为中国政治带来现代化成果。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因当时的反动政治统治而停滞不前。

比西方政治学稍晚一点进入中国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传入的政治思想。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邓初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推进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获得主流地位，并与时俱进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使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脉相承地成为全民现实的奋斗目标。事实表明，理论的先进性带来的是实践的可行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揭示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逻辑，所以，中国政治学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取得更多新成就。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及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因此，在新世纪里，政治现代化仍然是中国政治学的期盼，中国政治学应当更多地关注与回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通过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来促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现，从而使政治学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更完满地实现全民的期盼。

应用经济学的经世致用

□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谈敏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卷》的编纂工作自 2002 年启动以来，我们精心组织了上海财经大学各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投入大量精力，完成了这一堪称浩繁的项目。

本书对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作了全景式研究，全书综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在 20 世纪形成和发展的概貌，分述了中国现代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在 20 世纪百年的发展状况及主要成就，从而系统地勾勒出一幅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画图。

可以说运用学说史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总结 100 年来中国应用经济学演变及其源流，本著作具有奠基意义。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灿烂的经济思想，“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其中就含有对于经济学的应用性的强调，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我国的成长则是伴随着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生发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对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没有进行清晰地界定，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应用经济学所涵盖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理论均被大量引入国内。“洋务运动”倡导下的新式学校的建立最先进行了中国应用经济学教育的尝试，此后在兴办“西学”的风潮中，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分立以及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分类逐渐明朗，理论经济学的课程设置的法律专业之下，而商科专业开设了大量的应用经济学的课程。民国初期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了包括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统计学、区域经济学、会计学、商业数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应用经济学的学科体系。20 世纪上半期，囿于中国动荡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应用经济学虽有所发展，但是非常缓慢，同时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所处的地位也较低。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用经济学经历了初步发展、发展停滞以及全面发展的阶段，在其沿革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理论基础也经历了从单纯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模式为主向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转换过程，与之相适应，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应用经济学学科范畴也进行了演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先后进行了 3 次大规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专业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现实经济格局，形成了由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主要分支学科组成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20 世纪下半叶我国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种学术

